

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

王彬彬

中国古代诡谋文化十分发达。这种负面的文化遗产仍在现实中起着明显作用。最近几十年,诡谋文化极为“繁荣”。大量的通俗读物在贩卖诡谋文化。众多历史小说、武侠小说、武侠电视剧、古装戏,都在以诡谋取悦观众。官场小说和官场电视剧、商场小说和商场电视剧,也为迎合受众而极力渲染诡谋。大众因为本就具有的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而对诡谋文化兴趣强烈,而诡谋文化又进一步强化着大众的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这种文化走向与现代社会文明背道而驰,与法治社会建设冰炭难容。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
文学批评史”(批准号:
10JZD0010)阶段性成果

1989年1月,一本叫做《厚黑学》的民国旧书,由求实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应该没有想到,他们不经意间,打开了那只所罗门的瓶子。

《厚黑学》本是民国时期四川文人李宗吾所著。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求实版《厚黑学》的责任编辑也是无意间发现这本书的。1988年,这位年轻编辑想找一些没有版权制约而仍有出版价值的旧书重新出版,在图书馆中翻到了这本此前自己并不知晓的书,觉得有些意思,于是便决定重版。首印五万册,很快卖完。一年多后的1990年5月,进行第八次印刷时,印数已达到三十万册。2005年,该社又出版了插图本。这位责任编辑说,他们从未以任何形式宣传过这本论述“皮厚心黑”的书,但到2008年的时候,发行量已超过一百万册。这一百万册,仅仅是求实出版社到当年的发行数。“由于‘厚黑学’的畅销,而且不受版权限制,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厚黑学》,市面上版本众多,记者发现的最新版本《厚黑学》,即是2008年11月,刚刚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盗版盗印《厚黑学》数量更是无法统计,它们铺满了过街天桥、车站以及菜市场,早已经是流动书摊的镇宅之宝。”^①时至今日,这本

通俗易懂的论权谋、说阴谋的书,在大陆到底发行了多少,是很难统计的。

《厚黑学》重现江湖,带动了同类书籍的出版与畅销。最近几十年,各类书店、书摊,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书:《谋略学》、《历史上的智谋》、《历史文化中的智慧》、《中华权谋》、《权谋大全》、《权谋营销学》、《传统权谋学评析》、《权谋处世学问》、《诡秘的权谋哲学》、《博弈生存》、《博弈智慧》、《奸佞·诈伪·诡道》、《老猎人鬼点子》、《谋略论》、《谋略思维》、《谋略经纬》、《人生智谋》、《说谎与反谎术》、《中国权智》、《中国智慧》、《中国谋略事典》、《智慧生存黑皮书》、《办公室防人成功学》、《办公室政治:写字楼里的潜规则》、《中国历代权谋大观》、《诡谋》……这些书,往往也是在教人怎样在与人相处时扼喉抚背、出奇制胜,怎样在商场上唱筹量沙、暗渡陈仓,怎样在官场上篝火狐鸣、后发制人。一言以蔽之,教人怎样运用各种阴谋诡计求得人生的“成功”。这些书籍,可以说基本上表现的是一种“厚黑文化”。不妨以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诡谋》一书为例。这本书,以说书的腔调,分门别类、一个一个地讲述史书所见的先秦时期各种诡谋,目录中是这样一些小标题:“伍子胥的借尸还魂术”、“晋景公的假手藏奸术”、“东门遂的狐假虎威术”、“楚灵王的趁火打劫术”、“姬光的浑水摸鱼术”、“吕不韦的巧取天下术”、“勾践的软性杀人术”、“费无极的无中生有术”、“费无极的欺上瞒下术”、“狐射姑的密杀术”、“齐襄公的恋妹术”、“颡犬的大奸似忠术”、“蔡侯的借刀杀人术”……每个故事后面,还附有编写者的评语。“勾践的软性杀人术”,说的是越王勾践破吴后,迫使吴王夫差挥剑自刎的故事。勾践想杀夫差,又怕遭人议论,便用计迫使夫差自杀。对这种所谓的“软性杀人”,编写者是这样评说的:“想杀人,却又不愿落杀人之名,这就需要借刀杀人。这种杀人之刀可以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具有物理特性的东西,又可以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东西,只要你用得对,任何东西都可达到致人死命的目的。越王勾践就是用自己脑子里的生理活动,带动吴王夫差大脑的活动,指挥夫差的手臂拿起长剑,抹了自己的脖子,发生了生物性质变化。这是高层次的杀人技巧。”^②这番评说,虽然遣词造句颇为不通,但教人行坏之意却十分明显。

这类通俗的读物仅仅是一个方面。武侠文艺在20世纪90年代的如螭如螭,如沸如羹,是诡谋文化的另一种重要表现。所谓“武侠文艺”,主要指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武侠小说之所以大行其道,当然因为其中所谓的“武功”,但又绝不仅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有两种必不可少的东西:武功和诡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表现出江湖的险恶。江湖如果不比庸常人间险恶万分,那就不配称作“江湖”。武侠小说所虚构的江湖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界,如果只是一个全是明枪而绝无暗箭的世界,那就绝不能对许多人产生巨大吸引力,就绝不能制造出那么多的武侠迷。武侠小说中的各种阴谋诡计,是武侠小说让许多中国人如痴如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似乎是武侠小说歌颂者和批判者都未充分注意的。武侠小说中,必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这些恩怨,尽管千奇百怪,往往非常人所能想象,但总与某种奸计、某种阴谋联系在一起,总意味着一只读者许久看不见的手在偷天换日、移花接木,在瞒天昧地、巧取豪夺。有时候,一个恩怨后面,是一连串的奸计和阴谋。武侠世界的所争所夺,也无非是名、利、权,而名和权又往往是一回事。有“武功第一”之名,也就不难有武林霸主之实和号令江湖之权。在武侠小说中,“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是许多武林高手毕生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武功不高强不行,但仅仅有高强的武功也不行。在武侠世界里,拼的不仅是武功,还有诡谋。而诡谋,又必然与心狠手辣、冷酷无情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志于“一统江湖”、有志于夺取武林最高权力的武功高手,又必然同时是内心极其诡诈阴鸷之人。金庸在表现武功和表现诡谋两方面,都堪称“独步江湖”。金庸所虚构的江湖世界中,那种武功异常高强

而内心异常凶险的人分外多。如果说,金庸对所谓“武功”之神奇的表现前无古人,那么,他对人心之歹毒的表现,也是登峰造极的。仅仅一部《笑傲江湖》,就塑造了余沧海、左冷禅、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这些武功神奇而内心阴毒的人物形象。

武侠小说半靠武功吸引眼球,半赖诡谋动人心魄。武侠题材的电视剧,当然也是如此。而金庸小说和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更是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的几年,武侠题材的电视剧是十分走红的。由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构成的武侠文艺,渲染着暴力,也渲染着诡谋。

二

在诡谋文化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历史小说也有着标志性意义。四卷本的《康熙大帝》在90年代初产生影响,旋即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问世不久,二月河又推出了三卷本的《雍正皇帝》。《雍正皇帝》也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二月河以康熙、雍正为主人公的小说,着力于写清代宫廷中、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而诡谋,则在各种争斗中起着巨大作用。在表现诡谋方面,《雍正皇帝》之第一卷《九王夺嫡》最具代表性。《九王夺嫡》写的是康熙的九个儿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故事。小说以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为主线。这些皇子为争夺最高权力机关算尽,而所有的机关都是针对自己的骨肉兄弟。胤禛在谋士邬思道的筹划下,以一个接一个的诡谋,击败了对手,最终获胜。这些诡谋,往往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可以说,《九王夺嫡》把中国传统的诡谋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小说再“精彩”,受众面也有限,那么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则让无数中国人两眼发光、陶醉其中。90年代热播的所谓“古装戏”,当然不只《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在诡谋文化走向“繁荣”的过程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热播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90年代初开始,电视屏幕上,除武侠剧外,所谓“正说”或“戏说”历史的古装戏,也特别走红,而其中又以取材于清代的“辫子戏”居多。《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三国演义》之外,有《宰相刘罗锅》、《唐明皇》、《大明宫词》、《乱世英雄吕不韦》、《太平天国》、《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孝庄秘史》、《还珠格格》、《武则天》、《天下粮仓》、《水浒传》、《乾隆皇帝》、《皇太子秘史》、《甘肃米案》、《上官婉儿》、《一代廉吏于成龙》、《日落紫禁城》、《风流才子纪晓岚》等等。电视剧之外,还有电影《秦颂》、《英雄》等。

这些影视作品,文化品格和艺术含量虽有差别,但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两种倾向:对权力尤其是皇权的歌颂和对诡谋的有意无意的欣赏。针对影视屏幕上的这种现象,《深圳特区报》2003年曾做过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深圳特区报·文化周刊》于2003年6月9日发表了张德祥的长文《历史题材影视剧: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张德祥从“权力崇拜观念的凸显”和“权谋文化观念的渲染”两方面对热闹已久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张德祥指出,权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历史上起着十分负面的作用,而当代许多所谓“历史题材影视剧”却以欣赏的眼光来表现各种权谋,这十分有害于世道人心,十分不利于普遍诚信的建立和法治社会的建设^③。张德祥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学术文化界不少人欲对此话题发表看法。于是,《深圳特区报》就此问题开展了半年多的讨论,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对历史上的权谋文化与影视中的权谋表现做了相当精辟、深刻的审视与剖析。讨论告一段落后,《深圳特区报》将这些文章汇集成《权谋文化批判》一书,2004年5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我以为,这是一本有特别价值的书。

张德祥引发讨论的文章以“权谋文化”指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种场合玩弄阴谋诡计的现象,后来的文章也都袭用此一概念。但“权谋”这一概念似乎不能囊括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所谓“权谋”,本义指“随机应变的计谋”,现在则可引申为“为权而谋”。但历史上、影视中“谋”之表现则远不止这两种。所以,我觉得用“诡谋文化”指称一切阴谋诡计,可能更合理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官场小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如果说历史小说往往对历史上之官场诡谋极尽渲染之能事,那官场小说则不免对现实中之官场诡谋大书特书。官场小说之外,还有“商场小说”(或曰“商战小说”)。商场小说同样热衷于展示商场上的各种诡谋。当官场与商场难舍难分时,官场小说与商场小说也难分彼此。所谓“官场小说”,也总要写到商场,官场上的诡谋往往与商场上的诡谋相纠缠。所谓“商场小说”,也总要写到官场,商场的风云也往往与官场上的风云相激荡。要说有差别,那就是官场小说以官场为诡谋的主要表现场所,而商场小说则主要让诡谋被施展于商场上。不过,如果主人公是那种亦官亦商者,则连这种差别也难以确认。比小说更有影响、更能直观地展示诡谋的,仍然是电视剧。90年代以来,官场电视剧和商场电视剧也以对诡谋不遗余力的展示,给无数观众提供了“文化享受”。

武侠片、古装戏、官场剧,十几年间在电视屏幕上三足鼎立。三者都以对诡谋的夸张表现吸引观众。最近一些年,情形有了些变化,所谓“谍战剧”成为电视屏幕上的新宠。谍战有时在国共之间展开,有时在中共与日本侵略者之间展开,但也常常在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三方之间展开。间谍当然与诡谋不可分离。间谍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种诡谋的表现。于是,所谓“谍战剧”,就比此前的历史剧、官场剧、商场剧,更充分地表现着引诱、欺诈、陷害,更细致地演示着口蜜腹剑、鼠窃狗盗、挑拨离间。谍战剧在表现诡谋时,不仅可以比其他题材的作品更充分、更细致,也更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官员也好,商人也好,在立身处世、争权夺利时运用诡谋,在道德的意义上总有些不光彩。而间谍则不同。间谍,无论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哪种力量服务的间谍,运用诡谋都是其本职工作。如果说观众在观看官员、商人运用诡谋时,还可能多少有点道德上的鄙视、厌恶,那么在欣赏间谍的诡谋时,则不会产生丝毫道德上的排斥。

最近一些年以抗战或国共内战为背景的电视剧,还有一种既很可笑又颇堪玩味的现象,那就是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无处不在。电视剧本身不算谍战片,主要表现的是正面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等,但也要弄几个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特务在剧中兴风作浪,使屏幕上平添阴森诡秘之气。电视剧的编、导、演,对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没有基本的知识,甚至连二者的区别也全然不晓,根本不知道中统和军统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更不知道他们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式,只是按照自己对特务的理解、想象塑造着这类人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让电视剧对大众更有吸引力。

最近一些年的电视剧,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编导热衷于在革命队伍里设置“内鬼”,这也使得那些本身并非谍战剧的电视剧,带上些谍战的意味。表现红军、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也好,表现八路军的抗日也好,革命队伍里总潜伏着至少一个“内鬼”。“内鬼”不仅总是把革命队伍的动向及时地向国民党或日本人透露,更不停地运用各种诡谋,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事端。“离间计”是“内鬼”用得最多的计谋。两个领导(例如司令与政委)之间本来相互信任,“内鬼”想方设法让两人间产生误会,两个战友本来情同手足,“内鬼”挖空心思让两人间产生隔阂。革命队伍内部本来没有矛盾,“内鬼”用尽诡谋让矛盾产生,革命队伍内部有了矛盾,“内鬼”则用尽诡谋推波助澜、推涛作浪。本来是表现正面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电视剧,却如此热衷于以“内鬼”的诡谋吸引观众,这也说明中国的电视观众特别能为诡谋所吸引,特别能够从虚构的诡谋中得到享受,这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

诡谋文化对所谓“纯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当一些本身不追求通俗的文艺作品,一些以“阳春白雪”面目出现的小说,也往往有诡谋作用于其间。有研究者指出:“当下文坛中短篇小说兵法气味太浓,作家津津乐道于世俗生活中的隐秘,缺乏照亮人心的精神。”^④所谓“兵法气味”,所谓“世俗生活中的隐秘”,也就是各种诡谋表现。

三

诡谋文化如此繁盛,文艺作品,尤其是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争相以诡谋表现取悦受众,是文化研究者、文艺批评家不能等闲视之的。

毫无疑问,诡谋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难以根除的东西。如果把“人性”作为一个中性词,那么,诡谋无疑是人性的表现之一。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总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人在与他人的相处中,总难免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运用诡谋。但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有的人特别光明磊落,特别不屑于以诡谋立身,有的人则特别鬼崇奸猾,特别热衷于以诡谋处世。民族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诡谋文化异常发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表达诡谋的语言特别丰富,仅仅成语一项就多得惊人。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所谓“早熟”,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过早地发达。梁漱溟说:“中国人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书籍讲人事者,盖不止十之九,这只需一翻开中国书就晓得。中国人心思聪明之所用,何为如是偏于一边?此应究问者一。”^⑤按梁漱溟的说法,中国古代的书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讲人事”的。所谓“讲人事”,就是探讨人与他人的相处之道,就是研究一个人怎样对待他人才有利于自己。有大量的古书,就是赤裸裸地解说怎样算计、利用和战胜他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聪明心思”,都用在了捉摸他人、防范他人、对付他人上了。梁漱溟是在与西洋文化的比较中对中国文化如是判断的。他强调:“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从身体出发的西洋文化,在人生态度上是“向外用力”,学术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亦即怎样利用、改造和防范自然的问题。而从心出发,在人生态度上是“向内用力”,学术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⑥。在书中,梁漱溟还在赞同的意义上引用了他人的一种说法:中国“社会那么多伪君子,而没有真小人”^⑦。伪君子就意味着满腹诡谋而表面坦荡。这样的人,几千年来,充斥着中国社会,塑造着中国社会,支撑着中国社会。

鲁迅曾以自己的方式探讨过这一问题。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中说,20世纪初,他们在日本留学时,曾探究过“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⑧所谓“诚和爱”,正是诡谋的对立面,所谓“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也正是诡谋心理、诡谋习性的表现。诡谋与“诚”,与诚信、诚实、诚挚,水火不容。而一个习惯于对他人运用诡谋的人,心胸也一定是很凉薄的,一定是缺乏“爱”的能力的。一个民族的诡谋文化越发达,这个民族“爱”的能力就越微弱。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的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越严重,“爱心”就越萎缩。在《深圳特区报》2003年发起的讨论中,有些文章探讨了中国诡谋文化特别发达的原因。例如,沈金浩的《权谋文化繁衍的内在机理》一文,就颇多精妙的见解,其中特别令我认同的,是这样的说法:“而中国早熟且持久的专制统治及其相依存的官僚政治体系才是更加复杂多变的权谋滋生地,也是某些以兵法形式存在的权谋文化‘军转民’及变成贬义的权谋文化的应用场所。”^⑨诡谋文化特别发达,原

因应该是复杂多样的,但是,专制制度异常早熟,专制统治异常漫长,无疑是诡谋文化异常发达的重要原因。专制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诡谋统治。从权力顶端的帝王到最基层的官吏,都要运用诡谋维持他们的统治。当诡谋成为基本的政治方式时,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诡谋化。中国的专制统治延续了几千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几千年的诡谋统治,必然使得诡谋文化特别发达,必然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诡谋心理、诡谋习性。

当代学者丁立平在《人格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权谋人格”这一概念。权谋人格是后天形成的:“在人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中,在一个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比较‘丰富’的环境中,权谋人格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权谋因素而获得,而且这种学习心理往往是‘无意’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在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盛行的环境与情境中,极易发生、发展权谋人格。”^⑩“权谋人格”这个概念,或许更可以表述为“诡谋人格”。诡谋人格,应该说是人的成长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形成的。当人出生在一个诡谋文化发达的环境中,当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是遭遇各种诡谋时,就也会以诡谋应对诡谋,而诡谋人格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丁立平也强调,中国的权谋文化自古就很发达,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各种权谋权术被施展的历史,它对中国人权谋人格的形成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这类通俗文艺,往往是权谋文化和权谋人格的演绎,“这些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社会人格沉重的历史包袱”。丁立平特别提到了“文革”对传统的“权谋文化”的弘扬^⑪。“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这些深谙“权谋学”的人,在上层有充分的表演,他们把整个社会都拖入权谋的泥淖,以至于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兄弟之间也难免以“谋”相处,以至于骨肉亲人之间也要使奸弄诈。最近几十年,诡谋文化大为盛行,诡谋文艺大受追捧,与“文革”时期诡谋的泛滥,应该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在可以谈谈诡谋文艺与大众的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之间的关系。鲁迅曾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⑫。其实,“诡谋气”就是“三国气”之一种。《三国演义》之所以长期受广大中国人喜爱,原因之一,就是广大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诡谋心理、诡谋习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诡谋人格。这种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在大众心灵中形成接受诡谋文艺的“文化基线”。这种文化基线让人们们对《三国演义》这样的诡谋文艺感到分外亲切,让人们特别容易、特别乐意被《三国演义》中的各种阴谋诡计所吸引。同样,诡谋文艺在今天的盛行,也是大众心灵中的这种文化基线使然。中国的大众,本就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或强或弱的诡谋人格,而“文革”则大大强化了这种人格。这使得大众对各种出版物和影视作品中的诡谋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正是诡谋文化在最近几十年大为“繁荣”的原因。

四

诡谋是人性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之一。而表现人性是文艺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古今中外都有些优秀作品通过对诡谋的表现而探究人性,揭示人性的幽深复杂。所以,不能认为文艺绝对应该远离诡谋、丝毫不能对诡谋有所表现。但是,文艺作品表现诡谋,目的在于探究、揭示人性。诡谋表现只是探究、揭示人性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既然是一种手段,就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认为诡谋表现得越充分,对诡谋的过程刻画得越细致,对人性的探究和揭示就越成功、作品就越具有艺术价值。任何手段,都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也如暴力表现一样。文艺作品,有时也需要通过表现暴力而探究、揭示人性,

但不能认为暴力表现越充分、越细致,就越值得称道。

诡谋表现是为探究、揭示人性服务的,这是文艺创作者在表现诡谋时必须懂得的道理之一。诡谋同时又是人性的局限之一,是人性中的幽暗面,是一种人性之恶。在任何情况下,诡谋都没有绝对正面的价值。为诡谋辩护者,常拿战争作为例子。他们强调,在战争中,诡谋是必需的,是值得绝对肯定的。“兵者,诡道也。”这是《孙子兵法》中的名句。战争确实与诡谋难以分离。但是,战争有着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非正义的战争,本身就是绝对应予否定的,在非正义的战争中运用诡谋,当然就没有丝毫正面价值。战争中的诡谋不值得绝对肯定的原因,还不在于战争本身的性质。彻底消灭战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事实上,即便在两军交战中,诡谋也从来不具有无限度的合理性。人类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着对战争行为的制约,就有着规范战争行为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原则。中国古代兵法极其发达,战争中的诡谋令人瞠目。但是,中国也自古就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不斩来使”就是对战争行为的一种规约。进入现代,人类社会则有多种成文的《战争公约》诞生。这些《战争公约》对战争中的行为予以限制,也包括对战争中诡谋运用的约束。人类社会如果能彻底杜绝诡谋,那全人类的“幸福指数”都会大大提升。换句话说,如果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切关系中都没有诡谋的因素,人类社会将美好得多。中国的诡谋文化十分发达。但是,中国也自古就有对诡谋的否定、批判。“智圆行方”、“不欺暗室”、“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一类成语、俗话,表达的就是对不屑于运用诡谋的人格风范的肯定、赞美。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诡谋的逐渐减少,是诡谋在国际事务、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文艺创作者在表现诡谋时必须懂得的另一个道理,是应该以批判、审视的眼光表现诡谋,是应该将诡谋导致的苦难作为表现的重点,是应该以一种哀怜、悲悯的情怀面对人类的诡谋。

但今日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那些明确地在传授诡谋术的通俗读物,在以赞赏的笔调详细描述诡谋过程,而大量的小说和影视,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金庸小说对诡谋的叙述,就往往极其细致。《射雕英雄传》中西毒欧阳锋可谓满腔满腹都是恶谋毒计,而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对其谋其计的施展也总是写得很详尽。《笑傲江湖》中,余沧海、左冷禅、任我行、东方不败这些人,固然都是诡谋“大师”,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也都不厌其烦地细致表现了他们的各种诡谋在实践中的展开过程,而在诡谋施展上,在阴险毒辣上远超前辈的,是岳不群。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以探究、表现人性为指归。但是,在金庸塑造的江湖世界里,我们往往看不到人,只看到两种臆想的动物:神和魔。金庸塑造的“好人”,往往“好”得无以复加,其“好”总是一次次突破读者的预期,这不是“人”,是“神”;金庸塑造的“坏人”,往往“坏”得至矣尽矣,其“坏”也总是一次次挑战着读者的想象,这也不是“人”,是“魔”。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恶,都要受生理和心理条件的限制,因而也是有限度的。金庸塑造的“好人”和“坏人”,都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岳不群之坏,就大大突破了人性的极限。金庸把自己能想象到的人之邪恶,都寄托到岳不群这个“魔物”身上。金庸不是在通过诡谋探究人性,而是在通过诡谋探究“魔性”。诡谋在金庸作品中,不是表现人性的手段,是表现“魔性”的手段。

其他的许多文艺作品,在诡谋表现上虽然不至于如金庸那般匪夷所思,但也可谓无奇不有。细致地呈现诡谋实施的过程,是这类电视剧吸引观众的方式。广大受众本有着诡谋心理、诡谋习性以及不同程度的诡谋人格,这使得他们对各种诡谋的施展有强烈的兴趣。广大受众对诡谋感兴趣的另一种原因,则在于现实生活中诡谋还经常性地起着作用。诡谋文化的生产者为了钱而极力迎合受众的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诡谋文化与大众的诡谋人格,便难免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大众的诡谋人格使得唯利是图的文化商人大力生产诡谋文化,以供

大众消费,大众在消费诡谋的过程中,自身的诡谋人格也在一点一滴地强化着,大众诡谋人格的强化,使得他们对诡谋文化的需求有增无减,而又驱使文化商人在诡谋文化的生产上变本加厉。

诡谋文化是应该受到严肃批判、清除的精神遗产。诡谋人格应该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弱化。诡谋文化、诡谋人格,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我认为,所谓“文化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文化来说,首先就意味着诡谋文化的退场;所谓“人的现代化”,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最大限度地消泯;所谓“法治社会建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首先就意味着诡谋的用武之地逐步缩小。而诡谋文化的盛行导致大众诡谋心理、诡谋习性、诡谋人格的强化,自然也导致现实中诡谋的作用更为普遍和有力。这样一种文化走向和社会走向,与现代文明冰炭不容,与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

- ① 罗雪挥:《厚黑:丧失理想的“成功术”》,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2月11日。
- ② 王兴亚、程爱勤主编《诡谋》,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 ③ 张德祥:《历史题材电视剧: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载《深圳特区报》2003年6月9日。
- ④ 《作家、评论家直指当下文学创作弊端》,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2日。
- ⑤⑥⑦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第267—268页,第321页。
- ⑧ 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 ⑨ 沈金浩:《权谋文化繁衍的内在机理》,载《深圳特区报》2003年8月4日。
- ⑩⑪ 丁立平:《人格与社会》,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第105—107页。
- ⑫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颖